

張若名與五四時期的天津婦運

黃 嫣 梨*

一、引 言

張若名（1902—1958）是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核心——「覺悟社」的創辦人之一，後與周恩來、郭隆真等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批留學歐洲取得博士學位的傑出知識分子。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張氏回國努力於教學及文藝思潮的創作，對近代中國女權運動的思想及中法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本文主要介紹張氏於1919年至1920年五四運動初期，在天津展開的參政愛國與婦女解放活動的一段史事。張氏於這兩年期間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積極宣揚婦女之革新，除參與女權運動之事務外，更撰文闡論女權運動意義，對本世紀初之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張氏的影響是鉅大而深遠的。

本文主要內容分三章，首先介紹張氏之生平及其思想，繼而對其參與天津婦女運動之行誼，作一詳細綜合之論述，最後就其在這方面之貢獻與影響，作一簡要之闡析。

本文採用之資料，除張若名本身的著作外，主要由張若名之長子，現居北京，前職工程師之楊在道先生所提供之大部分為未經發表之一手資料。因此，本文之寫成，實有賴楊在道先生之大力協助，並謹此致謝。

*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

二、張若名生平與思想簡介

(一) 生平

張若名，河北省保定地區清苑縣溫仁村人。1916年考入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與鄧穎超（1904—1992）為同級學員，二人均為學校改革派之激進分子。^①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張若名更先後擔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評議部部長及「天津各界聯合會」庶務幹事。在1919年6月至10月期間，張氏三次成為天津進京請願代表（詳見下章論述）；又與周恩來（1899—1976）、郭隆真（1894—1932）等創辦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核心——「覺悟社」，並在社報《覺悟》之第一期中，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此文為天津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文獻之一。

為了逃避家庭的壓迫和可以繼續進行婦解運動，張若名在1920年11月，決定與周恩來、郭隆真等赴法勤工儉學。^② 留法之初，張若名擔任北京《晨報》駐法特約通訊員，在《晨報》發表不少政論文章。1922年初，張若名更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發表兩篇最早之中國婦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階級鬥爭〉和〈剩餘價值〉。兩年的共產黨宣傳工作，使張若名受到法國秘密警察的追捕。張氏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脅外，更以政治活動有礙於學業的進修，因而決心退黨，專意於學術研究。^③

^① 楊在道：〈中國的第一位法國女博士——張若名〉，《中國比較文學通訊》第15期（北京大學中國比較文學學會，1991年2月）；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黨史資料研究》第2期（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編集，缺出版年月），頁1。

^②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青年留法讀書工作的運動。大戰後，法國男性人口下降引致法國勞工短缺。中國青年計劃在勞工短缺的法國工廠工作，以賺取足夠的金錢在法國學校讀書。他們希望利用西方的技術促進中國現代化。自1919年至1921年初，超過一千六百名中國青年前往法國。有關這運動之資料，可參閱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四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80年出版）；張允侯、殷敍彝、李俊晨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兩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年）；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等三種重要的中文勤工儉學運動史料集。

^③ 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註^①。

1924 年，張若名考進法國里昂大學。三年內，張氏先後取得「心理學」、「普通哲學與邏輯學」及「倫理學與社會學」三科合格證書。1928 年更以「教育學」取得文科碩士學位。兩年多後，張氏又以〈紀德的態度〉一文獲得博士榮銜。^④

張若名取得博士學位後，與里昂中法大學學生，當今著名民族學學者楊堃結婚。^⑤ 1931 年，張氏與楊堃回國，執教於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講授「法國文學史」、「心理學」等課，並在學術刊物中發表大量研究文章，為中法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⑥ 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中法大學遷往南方，張氏亦隨校南下。1945 年日本投降，中法大學在北平復校，張氏亦回校繼續在大學內任教。1948 年，昆明雲南大學聘請楊堃擔任社會學系主任兼教授，張若名擔任中文系教授。1949 年，張若名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氏在雲大創立了「文藝批評教研室」，講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中國最早講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教授之一。迄至 1958 年，在反右風潮中，張若名被打成右派，因而投河自盡，終年 56 歲。「中國民主同盟」亦隨之開除其盟籍。1963 年與 1980 年，鄧穎超曾兩度為張若名平反。「中國民主同盟」亦恢復了她的盟籍。^⑦

(二) 思想

在張若名的著作中，清楚的反映了她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張氏在留學法國之前及在留法的初期，主要的著作都是申述她對婦女解放的意見與表達她的反帝國主義的思想。留學法國期間，張氏逐漸由論政轉向純學術性的研究。她獲得了里昂大學文科碩士學位之後，專心於法國著名作家安德烈·紀德的研究，並以〈紀德的態度〉一文取得博士學位。此後，張若名更專意於法國文學的研究及中法文化的交流，大量翻譯了中國的名著，如魯迅及郁達夫的作品等，發表在法文雜誌上。^⑧

④ 楊在道整理：〈張若名的著作〉（楊在道於 1990 年在北京整理、未經發表之自印文稿）。

⑤ 參見楊在道：〈張若名在法國〉，《傳記文學》第 6 期（北京，1990 年），頁 62—66。

⑥ 楊在道：〈張若名在北平〉（楊在道於 1992 年 2 月打印未經發表之文稿）。

⑦ 這段重要資料由張若名長子楊在道慷慨贈閱。另外還有他在 1992 年 1 月 27 日、2 月 20 日寄給筆者的函件。

⑧ 楊在道整理：〈張若名的著作〉，同註④。

張若名的婦女解放思想，甚有創見，影響也極為深遠。刊於《覺悟》的〈「急先鋒」的女子〉及刊於《婦女日報》的〈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二文，^⑨是張氏婦解思想的主要著作。張若名以為二十世紀的女子，必須具有一種革命的精神，去主動實踐婦女解放的事業。而這個事業的實踐，又當以推翻迷信形式之道德、男女心理生理之不同及男女職業之不平等三個觀念為急務，本文下章對此將有詳細之分析。

在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中，張若名深受五四愛國思潮之影響。她除了撰寫文章，如於北京《晨報》發表之〈英吉利之詭秘的外交策略〉^⑩、〈英國煤礦罷工別記〉^⑪、〈土希戰爭與德國形勢〉、〈歐洲勞動問題與其救濟政策〉^⑫等文章以申明其反帝國主義之思想外，她更參與反帝國主義的活動，如反對巴黎和約簽字運動、反馬良運動、反日貨運動等等，^⑬可見張氏熾烈的愛國精神。

至於張若名的學術思想，主要貢獻在於中法文化的交流。她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是研究法國文藝思潮的重要著作。1937年8月，張若名發表了她的另一篇代表作〈法國象徵派三大詩人——鮑德萊爾、魏爾萊諾與蘭芭〉。此文分別說明法國三位著名詩人的作品與生平，並特別介紹他們各具特色的象徵藝術，^⑭也是研究法國文學的重要文獻。張氏把法國的文藝思潮引進中國文壇，其貢獻當是不容抹殺的。

張若名於早期發表的文章〈留法儉學生之恐慌與華法教育〉^⑮中指出：

- ⑨ 〈「急先鋒」的女子〉刊於天津學生團體「覺悟社」出版的不定期刊物《覺悟》的第一期，於1920年1月出版。〈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刊於鄧穎超等人創辦的天津《婦女日報》，1924年3月18日刊出。
- ⑩ 〈英吉利之詭秘的外交策略〉刊於北京《晨報》（1921年6月15日至19日）。
- ⑪ 〈英國煤礦罷工別記〉刊於北京《晨報》（1921年6月29、30日和7月1、3、5日）。
- ⑫ 〈歐洲勞動問題與其救濟政策〉刊於北京《晨報》（1921年3月31日和4月1、2、3日）。
- ⑬ 詳見王貞儒：〈對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幾點回憶〉及〈五四運動中三個劇烈的鬥爭〉，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頁609—620。
- ⑭ 詳見〈法國象徵派三大詩人〉，文載《中法大學月刊》第11卷第4、5期合刊本（1937年8月）。
- ⑮ 此文為張若名留法初期的作品，完稿於1921年2月，北京《晨報》於4月10日和12日刊出。

中國現在的文化運動所傳布的，五花十色，無奇不有。有的談新思想，有的是談德謨克拉西，有的是談馬克思學說的，有的介紹布爾札維克主義……種種不一，而總合起來，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⑯

張氏又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勞動化」。她在文中反覆說明：「今後的要務，不只於叫勞動者覺悟，作有知識的人，並且要使有知識的人躬為勞動者。」

^⑰ 張若名的這個「知識分子勞動化」論，可以說是她的思想特色。在張氏的一生中，她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竭誠於社會的服務工作上，盡心盡力，確實能躬自實踐了其「知識分子勞動化」的理論。

三、張若名與天津婦女運動

(一) 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之婦運積極分子

1916年，十五歲的張若名，在天津小學畢業後，隨即考入天津「直隸（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以下簡稱「女師」）為第十級學員。^⑱ 該校創辦於1906年，由近代著名教育家齊璧亭任校長，是當時中國一所歷史悠久、水準極高的女子中等專業學校，學制是「中學四年一貫制」。張若名為第十級學員，與鄧穎超同級，^⑲ 張、鄧也因此由同學的相交開始，演變為日後愛國運動及婦女運動的伙伴，一同為她們的理想而努力。^⑳

五四時期具有強烈革新思想的郭隆真，也是天津「直隸（河北）第一女

^⑯ 張若名：〈留法儉學生之恐慌與華法教育〉，北京《晨報》（1921年4月10日），同上註。

^⑰ 張若名：〈留法儉學生之恐慌與華法教育〉，北京《晨報》（1921年4月12日），同上註。

^⑱ 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註①，頁1。

^⑲ 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鄧穎超革命活動七十年人事記：五四運動和黨的創建時期》（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年），頁1—2。及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上註，頁1。

^⑳ 鄧穎超在〈五四運動的回憶〉中說：「我們（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之女生）當時，雖然還不知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有滿腔的愛國熱情。為了救國，為了民族的獨立，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勢力，有勇於犧牲一切，在所不計的革命精神。」原文載東北大學編：《「五四」紀念文輯》，轉載於《中國婦女》第9期（1959年）。

子師範學校」的學生。^⑯可以說，民國初期的愛國革命活動中，婦女界絕大部分傑出人物都曾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在五四愛國革命的活動中，「天津女師的同學，當時在學聯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和南開同學一樣有決定性的。」^⑰

隨著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同時掀起了婦女解放運動，這也是五四的民主運動中的一個主要內容。當時的婦解思想，主要提出的是「男女平等」、「反對包辦婚姻」、要求「社交公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廢除娼婢」、「廢除裝飾」、「大學開女禁」、「各機關開放任用女職員」等。^⑱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是天津婦女運動的核心，^⑲鄧穎超、郭隆真、張若名、劉清揚、王貞儒等均為其中的積極分子。在她們的推動下，天津「女師」成立了「女界愛國同志會」，爭取男女平等及新女性權益。

張若名當時就讀於如此開放的學校，而本身又為一激進之知識分子，因此她之能夠成為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除本身的稟性，她的學校背景是不容忽視的。

(二)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之代表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由外交問題引發的愛國運動，但也加速了文學的革命和婦女的解放等等連鎖性的運動。誠然，束縛著婦女的封建制度及羈勒著婦女的傳統思想的瓦解，並非由「五四」開始。清末中日甲午戰後，隨著新思潮的倡導，婦女的生活，已漸漸地轉變到一個新的方向，甲午戰後，已

^⑯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與天津市婦女聯合會合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年）。

^⑰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同註^⑯。

^⑱ 參閱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主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全國婦聯婦運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19—1926）》（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

^⑲ 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不僅是天津一地婦解運動的核心，而且是當時全國婦解運動的核心。據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中的記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學分別組織的學生聯合會合併，共同工作。……當時北京男女學聯會的合併晚於天津的學聯。她們很羨慕我們天津學聯的合併和我們工作的良好表現。」天津學聯之成功地男女成員合併及男女平等擔任工作，乃有賴於天津女師的爭取與推動。天津女師在本世紀初期的中國婦解運動中，確實起著領導性的作用。

有興辦女校的運動。隨著辛亥革命，女權運動亦迅速展開，不少女子投軍效力。辛亥以後，又有不少女子同盟會、女子共和會及男女平權維持會的建立，可見婦女新生活轉變的迅速。²⁵但婦女真正的脫離封建的生活而獲得獨立自主人格的生活，仍是在民國以後，而「五四」運動究竟是一個重大的關鍵，它使婦女解放運動開展了積極的新局面。

1919年4月下旬，北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對於在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表示「欣然同意」。全國人民義憤填膺，一致譴責以徐世昌、段祺瑞為代表的腐敗政府賣國圖存的可恥行為，5月4日以北京大學愛國學生為主的示威請願慘遭鎮壓，消息傳到天津，5月5日郭隆真首先在「女師」的教室和食堂裡宣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號召同學們立刻組織起來，採取行動，緊接著九至十四級的學生分別推選出本級代表數人商議行動方案，鄧穎超、張若名、王貞儒等被選為十級代表。²⁶

第二天（5月6日），「女師」三十幾名學生代表，在郭隆真的主持下，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決定聯合中西女中、嚴氏女中、貞淑女中等女校同學，共同組成一個聯合的婦女團體。經過十幾天的緊張工作，5月25日，在義倉街江蘇會館，舉行了有數百名婦女參加的「女界愛國同志會」（以下簡稱「女愛會」）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會章」，選舉了劉清揚和李毅韜二人分別擔任為正副會長，鄧穎超、張若名、郭隆真為評議委員。稍後「女愛會」改組，張若名被選為評議部部長。²⁷「女愛會」的成立，可以說是五四時期中國反帝國主義和革新運動的一次有力的婦女群衆組織。該會以女學生為主，同時也吸收一些女教師、女職員、宗教團體的婦女及一部分家庭婦女參加，成立後，會員達六百人，而且不斷擴大組織。在「女愛會」的領導下，會員進行了一連串的演講，²⁸並聯合「天津各

²⁵ 詳拙著〈五四運動與婦女解放〉，《從詩詞看中國婦女心態——文史雜論與生活小品》（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頁162—168。

²⁶ 《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頁609—612。

²⁷ 詳見白眉：〈五四運動在天津〉，載《五四運動回憶錄》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頁243—248。案：當時的社團大多數設有評議部，它是社團的領導核心和決策機構。

²⁸ 「女愛會」當時的正副講演隊長是郭隆真和鄧穎超。見王貞儒：〈對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幾點回憶〉，《五四運動回憶錄》下，頁610。又最近出版之王振德編：《工青婦大辭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對「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組織，有很詳盡的介紹。

界聯合會」抵制日貨、赴京請願等活動，又籌建平民女校，創辦《醒世》周刊，在北京、上海、山東等地發行。^{②9}

1919年6月18日，「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張若名等被「女愛會」選為參加該會的代表。張氏又以其卓越的領導才華被推選為各界聯合會庶務科幹事。庶務科主要是在各項宣傳、遊行、示威請願活動中擔任後勤支援，負責準備工作、善後工作和財務管理等工作。^{③0}此後，所有「女愛會」評議部的會議都由張若名主持召開。「女愛會」除了爭取婦女權益與參與愛國運動外，又有雜誌社和婦女補習班的組織，增進婦女知識。1919年10月7日，《天津各界聯合報》曾以〈兩周間的女界愛國同志會〉為題，報導了「張若名主席」主持「評議部開會」的情況，會上「評議員和雜誌人員」共同討論了「雜誌內容」，此外，會上又決定「將家庭講演改在官立小學」，講課內容為「注音字母」。^{③1}可見張若名主持的「女愛會」，除了關心政治外，對學術與知識方面，也是十分重視的。

1919年12月，「女愛會」與「天津學生聯合會」合併，成立「新學聯」，由張若名任主席，聯合天津各院校男女學生，團結愛國，努力革新。^{③2}在五四運動時期，「女愛會」對掀起天津反帝國主義的愛國熱潮及天津婦女運動的開展，確實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五四時期之參政愛國與婦女解放活動

從1919年5月至1920年11月，是張若名在天津參與五四運動最積極的時期。這時，張氏的活動主要是集中在幾個社會團體，其中尤以上述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各界聯合會」為

^{②9} 有關「天津各界聯合會」及「女愛會」活動的詳細情況，可參閱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0} 《五四運動在天津》，同上，頁142—143。

^{③1} 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註①，頁42。

^{③2} 1919年12月3日的天津《益世報》，有天津「新學聯」成立的消息報導。《益世報》就此標題〈男女各校學生會舉行聯席會討論合併事宜〉中有云：「昨日（12月2日）午後，男、女各校學生聯合會、各校評議員，為男、女合組事項，在勸學所後院新會所內開全體大會。到者十八校二十一人，由張若名主席。」至於「新學聯」成立的正式通告，則於天津《益世報》1919年12月10日登載。

主。^⑬ 張若名所關注的不但是愛國問題，而且致力於婦女的平等待遇問題。

身為「女愛會」與「學聯會」的代表，張若名於 1919 年下半年，多次奔波於京津之間，做了大量宣傳聯絡、支援營救學運的工作，更而參加了示威請願的行動。綜論張氏五四時期之參政愛國活動，主要有下列三次：1. 1919 年 6 月之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2. 1919 年 8 月之反馬良運動；3. 1919 年 10 月之反日本請願活動。

1. 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

1919 年，「巴黎和會」各國代表決定 6 月 28 日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天津各界聯合會 6 月 26 日下午決定，派張若名、劉清揚和另外八名男代表前往北京，與先到北京的山東代表聯合行動，反對政府代表簽字。^⑭ 張氏等於 27 日到達北京，隨即加入了全國各地請願代表團的「反簽和約」鬥爭行列中。在全國人民的大力反政府示威下，中國派往巴黎的三位代表終於沒有在「和約」上簽字。^⑮

2. 反馬良運動

1919 年 8 月，山東鎮守使馬良在濟南槍殺了三名回族愛國人士，緊接著全國掀起了要求政府懲辦馬良的巨大浪潮，張若名作為天津進京請願代表團成員，於 8 月 23 日會同北京和山東的代表三千餘人，抵北京新華門，向總統徐世昌示威請願，但遭到警察鎮壓，而天津代表關錫斌被打至重傷，郭隆真、劉清揚等被捕。張若名返回天津，再會同周恩來及其他代表赴京，一

^⑬ 這時期張若名將其非凡的組織能力和精神集中在女權運動和範圍較闊的政治運動之中。據「覺悟社」社員譙小岑回憶說：「張若名曾在新學聯的三人執委會任職，這是天津首批男女結合的組織之一。」譙氏又評論說：「作為這麼重要的委員會中唯一的女性，張以勤奮、專心、謹慎和高效率聞名。」參見譙小岑：〈覺悟社及其成員〉，《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 15 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81—182。

^⑭ 見〈各界聯合會確定赴京代表名單劉清揚張若名被推為晉京代表〉，天津《益世報》（1919 年 6 月 27 日）；〈天津代表赴京請願書〉，天津《益世報》（1919 年 6 月 29 日）。並參馬惠卿：〈五四運動在天津〉，《近代史資料》第 2 冊（1958 年 4 月），頁 94—103；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同註^⑩，頁 164—169。

^⑮ 參見〈實現拒簽和約後女界愛國同志會致電巴黎和會中國專使〉，天津《益世報》（1919 年 7 月 5 日）。

方面繼續請願，一方面支援在京被捕代表。8月28日，張若名及若干代表在請願行動中被捕。政府因懾於全國各界的反對聲浪及在全國一致的輿論鞭撻之下，不得不借著有人「保釋」而下「臺階」，終於在8月30日將被捕代表全部釋放。^⑯

3. 反日請願活動

1919年9月下旬，為了再次要求懲辦山東鎮守使馬良，及反對政府就山東問題與日本單獨談判，「天津各界聯合會」再一次派出張若名、郭隆真、關錫斌等代表進京請願。10月1日，全國各地代表齊集總統府門前，當場推選了三十二名代表謁見總統。三十二人當天全部被捕。張若名立即趕回天津商討營救辦法。他們決定在10月10日國慶日組織一次大規模的遊行集會，以喚起更多民衆參加此次愛國活動。10月10日，遊行集會按計劃進行，但是遭到警察廳長楊以德破壞。天津各男女學校的學生隨即罷課表示抗議。「女愛會」和「津學聯」於10月13日通過「執行部」聯合發布了「短期停課宣言」。他們發動了二千名學生和萬多名市民，於10月20日下午，聚集省長公署門外請願，要求懲辦楊以德。直到曹銳答覆「吾決不食言，一定有辦法」之後，請願代表才退出省公署。隨後，請願的各校女生，分別整齊列隊抵達河北女子師範學校，由張若名向大家報告和曹銳省長會談的經過。^⑰此時，全國各地亦展開了各種形式的營救在京被捕代表的活動，終於，政府被迫於11月將逮捕的代表全部釋放。張若名代表「天津各界聯合會」和「女愛會」對這批被釋放的代表迎接與慰問。^⑱

張若名參加的反日請願運動，除了1919年10月上述的一次外，1920年1月，因「福州慘案」中日本射殺中國學生和警察的緣故，又再次參加了

^⑯ 有關反馬良請願活動之資料，可參閱管易文：〈五四時期參加赴京請願活動的回憶〉，《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3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4—49；〈請願代表的回憶〉，《天津學生聯合會報》（1919年9月1日）；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註①，頁42—43；廖永武：《天津現代革命運動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0—13；《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同註⑨，頁278—287。

^⑰ 見《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同註⑨；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註①。

^⑱ 馬惠卿：〈五四運動在天津〉，同註④，頁103—104。

另一次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此次示威又遭到了省公署的大力鎮壓，張氏入獄，同年7月被釋放。

在這幾次的愛國運動中，張若名及其他天津婦女代表一直擔當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參政運動就成了婦女運動的中心。她們以參政運動作為推進婦女解放工作的重要途徑。^{③9} 她們的勝利，正好向全國人民展示了婦女的才華及她們在愛國運動中的鉅大作用和貢獻。本文主要論述張若名的婦女解放事業，因此對這些參政活動，恕不贅述。^{④0}

四 從「覺悟社」到「急先鋒」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中說：

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們男女同學中比較進步的積極分子二十多人，感覺需要一個比學聯的組織更嚴密一點的團體，更能作一些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組織了個小團體——「覺悟社」。^{④1}

這二十多位積極分子除鄧穎超外，包括了周恩來、張若名、郭隆真、諶小岑、于蘭渚、徐麟、關錫斌等人。諶小岑在回憶「覺悟社」的成立過程中，有更為詳細的憶述，據諶氏稱，1919年9月初天津進京代表周恩來、郭隆真、張若名等在從北京返回天津的火車上，總結了「反馬良運動」的經驗教訓，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聯合、要團結。郭隆真首先提出今後「女愛會」要與「學生聯合會」緊密配合。張若名繼而建議「女愛會」的女校學生全體

^{③9} 天津「女愛會」代表之一劉清揚云：「在廣大人民請願的行列之中，婦女總是居於前列，為防止或抵制軍警凶狠的打擊，不但作衛護男性的先鋒隊，而且其能力、勇敢、以及策劃行動，無不與男子並肩，共同努力，尤其中國婦女運動之深入群衆中，就是在五四時期開始的。」見〈五四回憶〉，載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96。又參見羅瓊：〈參政運動在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地位〉，原載《婦女生活》第4卷第11期（1937年6月16日），轉引自全國婦聯婦運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頁520—523。

^{④0} 詳情可參閱廖永武：《天津現代革命史》，同註^{③9}，頁13—15；及《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同註^{④0}，頁464—468。1920年1月30日的天津《益世報》對這次請願行動，有很詳細的報導。1920年7月5日，《益世報》的〈天津學聯上書北京政府〉及7月18日〈代表勝利歸來〉均對此事作了綜合的記述，可參閱。

^{④1} 原載東北大學編：《「五四」紀念文輯》，轉載於《中國婦女》第9期（1959年）。

加入「天津學生聯合會」。周恩來進一步表示需要創辦一個刊物，更好地宣揚革命思想。^⑫他們回到天津後，立即依照計劃進行。周恩來擬出十名學聯骨幹名單；張若名也從「女愛會」學生中提議十人為代表。1919年9月16日，學生代表男女各十名，組成「覺悟社」，並決定出版刊物《覺悟》。

「覺悟社」的創立，標誌著天津學生團結愛國精神的進一步行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覺悟社」由二十名學生組成，男女各佔一半。^⑬當時的社會，以女性進入學會已屬難得，而「覺悟社」的創辦人及最初的成員竟有半數為女性，實開男女平等思想的先導。於此，亦可見出郭隆真、張若名及鄧穎超等人在參政運動的同時，對婦女解放工作的大力推進。「覺悟社」的創辦，是這方面的一個成功例子。

《覺悟》雜誌於1920年1月20日創刊，張若名在創刊號上以代號「衫六」署名，發表了論述婦女解放事業的〈「急先鋒」的女子〉一文，為張氏申述其婦女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篇文獻。張若名首先指出女子解放要從女子本身主動做起：

女子解放從女子解放作出，不要等著旁人解放。……在新舊更代的時候，必定要有人作先鋒，打前路，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種革命精神去實行解放。^⑭

張氏進一步指出若要去除數千年來積習已深的男女不平等思想，必須要1. 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觀念；2. 鑷除男女心理生理不同的觀念；3. 打破男女職業

^⑫ 見諶小岑：〈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天津「覺悟社」〉，《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頁579—597。並參諶志篤：〈參加五四運動的幾點回憶：「覺悟社」在天津學生運動後期的領導作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同上，頁605。

^⑬ 林如蓮以為：「1919年9月覺悟社由二十名天津青年組成，值得注意的是半數以上的創辦人屬於女性，不同『新民學會』或『少年中國學會』那樣，創辦人均為男性。」見林如蓮：〈超越障礙：張若名與安德烈·紀德〉一文自印本。林如蓮曾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題目寫了一篇博士論文〈開拓的一代——中國共產主義在歐洲，1919—1925〉（芝加哥大學，1985年）。

^⑭ 〈「急先鋒」的女子〉，同註⑪；此文在《覺悟》發表時，張若名是以她在社內的代號「衫六」來署名的，其後各選集轉載時，則採用張若名正名。此處轉引自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主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同註⑪，頁49。並參〈天津覺悟社社員代號及化名〉一文，載《周恩來詩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110—111。

不平等的觀念。在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觀念中，張若名建議實行男女同校、男女同工、男女公開社交；在鏟除男女心理生理不同的觀念中，張氏以為女子應當接受如男子一般的同等教育；而在打破男女職業不平等的觀念中，張氏認為女子不必一定「主內」，女子應當有自主的職業及獨立的經濟。^{④5}

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張若名繼而指出婦女解放事業應有一個預備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要做三件事：分別是徵求同志、知識預備和經濟預備。她對這三方面的工作，詳細論述了自己的見解，比如在「徵求同志」這一部分裡，她提出若要打破女子的黑暗，必得徵求當「先鋒」的同志。同志的資格，必需具備了1. 真有提攜女子的心意；2. 具有犧牲的精神；3. 抱有獨身的主義。最後，張若名在總括這篇文章時，再次強調女子必要爭取平等知識、獨立經濟，同時，「要具革命的精神，去實行解放，少數人預備造多數人的解放生活。」^{④6}

身為急先鋒的新女性，張若名強烈呼籲婦女破除迷信，不再成為男人的附屬品，而要成為革命的基本分子。〈急先鋒〉發表於 1920 年，四年之後，張若名在留法期間，又以「一峰」之筆名發表了一篇更成熟的文章〈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對於婦女解放思想有進一步的體會。比〈急先鋒〉一文來說，〈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一文特別強調女子參政的重要性，而且建議「做女子參政運動的人，當結連主張女權的政黨。」^{④7}而且，「要打破私有制，打破家庭的束縛。」^{④8}於此，張若名更加強調了婦女參政為進行婦女解放的最有效的途徑。這點可能是張若名赴法後，感覺到在先進的歐洲國家，女子也受到政治和經濟的壓迫，因此只提出女子教育並不足夠，女子參政可鼓勵女性主動而積極地創造社會合理的新環境。

從「覺悟」到「急先鋒」，張若名正好代表了中國婦女在本世紀初革新過渡時期中的那一份自覺自勵的精神。

^{④5} 〈「急先鋒」的女子〉，同上，頁 50—51。

^{④6} 〈「急先鋒」的女子〉，同上，頁 52—58。

^{④7} 〈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同註⑨。

^{④8} 同上。

四、張若名在天津婦女運動中之貢獻評述

張若名在中國婦女解放的事業上，並不限於理論，而能身體力行，自我實踐。最顯明的有兩個例子，第一，鼓勵婦女參政以推動婦女解放；第二，反對媒妁婚姻，確立婦女自主獨立的人格。

鼓勵婦女參政以推動婦女解放，這一方面，張若名除了撰寫〈「急先鋒」的女子〉、〈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巴黎無產階級女子的生活概狀〉、〈勞動問題〉等文章，⁴⁹除在理論上宣揚愛國觀念，批評帝國主義外，如前所述，她自己也以身作則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尤其是五四時期，張氏可說是天津五四先進革新分子的中堅人物，在多次赴京請願中，張氏屢次擔當了天津一地之代表，以躬行實踐的犧牲精神，顯示了「急先鋒」的新女性形象。

自五四運動以來，反傳統的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少女反對包辦之媒妁婚姻為最，例如 1919 年長沙少女趙五貞之抗婚自刎；⁵⁰ 1920 年長沙女學生李欣淑之拒嫁出走等，⁵¹均深深地影響著張若名的思想。因此，張氏在其父母安排的媒妁婚姻進行當中，決定採取行動，抵抗這種守舊婚制，

⁴⁹ 〈「急先鋒」的女子〉與〈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二文，上節已有介紹。〈巴黎無產階級女子的生活概況〉等幾篇政論文章，均於 1921 年發表於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

⁵⁰ 趙五貞因不滿父母包辦婚姻，決心以死反抗，在男方迎娶之時，用剃刀在花轎中自殺身亡。事件發生後，轟動社會，長沙《大公報》就此事展開討論。毛澤東在兩周內連續發表九篇文章，指出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朽，社會制度的黑暗。周南女校學生在毛澤東的倡導下籌備並召開了紀念趙五貞大會，並在她們主辦的周刊《女界鐘》上出了一期特刊，控訴傳統社會的罪惡，號召婦女爭取自身解放。參見啓民：〈趙五貞女士自刎紀實〉、斯詠：〈關於趙女士自刎以後的言論〉及仲明：〈關於趙女士自刎以後的言論〉幾篇文章，載《女界鐘》特刊第 1 號（1919 年 11 月 21 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主編，北京春秋出版社於 1989 年 10 月出版的《中國婦女運動史》，及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於 1989 年 8 月出版的《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二書，對趙五貞自刎一事亦有詳細之紀述，可參閱。

⁵¹ 見《中國婦女運動史》，同上註，頁 105。1920 年 2 月 28 日天津《大公報》之〈李欣淑女士出走後所發生的影響〉一文云：「她抱百屈不撓的精神，實行奮鬥的生活，把家庭的習慣、名教的藩籬，一齊打破；她有徹底了解的新思想，……在新青年方面，可以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教訓。」

維護婦女自主獨立的人格。1920年10月，她和郭隆真等「覺悟社」社員通信，爭取幫助，離家遠走，並且在極艱鉅的環境下，參加勤工儉學，遠赴法國留學，⁵²確實表現出她底積極進取、擇善固執的倔強性格。說她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女權運動先驅，實是當之無愧的。

此外，張若名甚具開創精神，可以說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健將。在女權運動的初期，天津的「女界愛國同志會」及「覺悟社」是推動中國女權運動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組織。⁵³張若名同時為這兩個組織的創辦人之一。她具有大無畏的開創精神，不怕艱苦，不懼犧牲，努力為新一代的女性爭取自由與幸福。

在提倡婦女獨立自主的人格方面，張若名特別注重兩點，即婦女經濟的獨立與婦女教育的平等。張若名對婦女經濟的獨立，有很獨到的見地。她以為：

現在女子職業的範圍，只限於小學教授，或者就是盡主婦的職務；其他工商業知識一點不懂，當然沒有職業可說，經濟上既不能獨立，所以在家裡要受男子的轄制。求女子解放，先求女子得工商業的知識，開創女子經濟的獨立方法，然後才能脫離苦海。⁵⁴

這裡強調了經濟獨立、職業範圍及職業知識的連鎖關係。在職業知識方面，

⁵² 張若名離家後，和郭隆真共同住在北京郭隆真妹妹家裡，愛國律師劉崇佑十分支持學生，聽說她倆要赴法勤工儉學，主動捐贈三百元。另外由津學聯周恩來等推薦，由張若名出面，由劉清揚的父親擔保，向津學聯借支了由學聯保管的「萬德成」罰款中的一千元。因此，張若名的出國，可以說是「由天津各界保送」的。見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同註①，頁48。

⁵³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是一個以女學生為骨幹的廣泛的反封建的愛國的婦女團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簡章〉中明確指出：「本會以提倡國貨並喚起女界之愛國心為宗旨。」同時，該會亦鼓勵婦女參政以推動婦解。見天津《益世報》1919年5月5日之〈天津婦女之奮起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成立〉。鄧穎超在記述「覺悟社」的成立時說：「大家（覺悟社會員）還沒有一定的信仰。……只知道他們的革命（蘇聯十月革命）是把多數被壓迫者解放了，引起了我們的同情和憧憬。」（〈五四運動的回憶〉，同註②）「覺悟社」主旨之一在解放被壓迫者，至於婦女之解放，亦為「覺悟社」所積極爭取者。《覺悟》第1期載〈覺悟宣言〉云：「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亦為當時「新女性主義」的精神。

⁵⁴ 張若名：〈「急先鋒」的女子〉，同註⑨。

張氏又提出了工商業的知識，打破了農桑畜牧、教育文藝的局限。她的建議，可說是實際而進步的，對於婦女教育的推廣，張氏更加不遺餘力，因為她以婦女解放為婦女本身的事業，必須要婦女自己身體力行，所以「女子應當解放的事，受過教育的，就容易明白。」⁵⁵但明白了解放的事還是不足夠的，婦女應爭取教育平等，這樣才有機會與男子一樣，在社會上作出貢獻。但婦女教育求平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爭取到的，因此，張若名提出：

應該由少數同志先求本身教育平等，謀高深知識，然後推到大多數的教育平等。⁵⁶

這樣循序漸進的改革方法，既穩健，又可行。張氏的建議，處處表現出她識鑒的洞達，態度的謹慎。她在留法期間，對中國的婦女解放，繼續積極的參與。1924年，她寫了〈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一文，以更成熟的觀點，去貫徹其婦解思想外，在社會流行的當時，她又與郭隆真聯名寫了一信〈兩個法國朋友的信〉給《婦女日報》的主辦人劉清揚、鄧穎超、李峙山等，向《婦女日報》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她們主張：激起廣大婦女爭取自我解放，爭取中產階級婦女的同情，吸收知識分子婦女加入到無產階級隊伍中來。⁵⁷這兩篇文章，分別於1924年3月18日及3月23日刊登於天津《婦女日報》。文章的內容，也顯示了她們受到激進思潮的影響。

張若名的一生，從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之激進學生，到中國燕京大學、雲南大學之資深教授，其間她不僅爭取了平等的教育，獲得了自由的婚姻，同時也發揮了其卓絕的參政與文學才華，實踐了她獨立自主的經濟與人格。張若名可以說是五四時期天津婦女運動激進派的代表人，又是中國女子最早的法國文學專家。她在我國近代新文化運動史上應該有其地位和貢獻。

⁵⁵ 同上。

⁵⁶ 同上。

⁵⁷ 見郭隆真、張若名：〈兩個法國朋友的信〉，天津《婦女日報》（1924年1月3日）。